

土耳其战略转型及其局限

田文林

[内容提要] 近些年,土耳其战略重心日趋由西方转向东方。这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西向战略边际效应递减趋势日益明显、土耳其东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改善、土耳其国内政治气候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从长远看,土耳其东向政策的具体实施由于种种限制将会遇到重重困难。作为中等规模的国家,土耳其更适合推行东西平衡的中立政策。

[关键词] 土耳其 战略转型 东向战略

[作者简介]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民族宗教和第三世界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土耳其战略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¹

在中东诸国中,土耳其的国家定位最为模糊。它地处欧亚大陆结合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部分却在欧洲境内;它是地中海国家,同时黑海海岸线也十分漫长。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④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家定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⑤一位土耳其问题专家称,土耳其是伊斯兰、突厥和西式现代主义三者的融合。^⑥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⑦这些不同的牵引力代表着不同的战略方向和投入重点,使土耳其始终面临战略定位的困惑。

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奉行“面向西方”的对外战略。早在土耳其刚独立时,“国父”凯末尔就为国家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他宣称,土耳其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融入西方体系。“文明只是

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⑧这些年来,土耳其不断强化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明确将自己定位为西方世界一员,甚至在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体育比赛季,土耳其也要挤在强手如林的欧洲赛区。相形之下,土耳其对中东事务显得漠不关心。冷战时期,土耳其尽管与以色列、伊朗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也曾出面组建“中央条约组织”,但仍将自身定位为“欧洲国家”,而鲜少承认自己是中东国家。^⑨

然而,近些年来,土耳其外交东向的趋势不断加强,战略转型趋向令人注目。土耳其外交转向东方

¹ 这里的“西方”和“东方”是一种简约的说法,它不完全是指地理位置,而更多是从政治、经济角度而言。

^④ 转引自[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⑤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91, p. 3.

^⑥ Kemal H. Karpat, “The Ottoman Rule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1994”, Edited by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 Westview Press, 1996, p. 3.

^⑦ [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⑧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7页。

^⑨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pp. 66-48.

并非始于今日,却热于今日。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 1973 年石油价格暴涨和 1974 年塞浦路斯危机之后,土耳其明显感受到了中东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经济潜力,以及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无情无义,由此使土在对中东漠视半个世纪后,首次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利益。¹

土耳其真正重视中东、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则始于当代。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2002 年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对外政策日趋偏离面向欧洲的凯末尔主义,开启了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路线。其具体表现,一是与以色列关系日趋疏远。土耳其早在 1949 年就承认了以色列,土以两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但 2008 年以色列入侵加沙事件之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谴责以色列,此后又取消土以联合军演,不再允许以色列空军进入土耳其领土训练,双方关系明显趋冷。2010 年 1 月,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在召见土耳其驻以大使时,用矮沙发待客,这种怠慢态度令土耳其对以色列不满情绪高涨。同年 6 月,以军袭击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促使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两国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二是与伊朗关系不断加强。伊朗现今正处在国际斗争风口浪尖,而土耳其毫不避嫌,频频向伊朗示好。2009 年 6 月,内贾德在争议中蝉联伊总统后,土耳其率先表示贺喜。当年 12 月,埃尔多安在访伊时公开表示西方对伊制裁是“专横跋扈”,并称那些反对伊朗核活动的国家应首先放弃核武器。2010 年 5 月 17 日,土又与巴西一道说服伊朗,签署了在土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的三方协议,伊核问题一度出现缓解曙光。三是与阿拉伯国家日益靠近。从 2008 年起,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开始举办“土耳其-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土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日趋机制化。同时,土耳其还积极介入巴以和谈和叙以和谈,充当调停者角色。

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战略重心正强势转向中东,而且明显与中东“弱势群体”站在一起。因此,土耳其的“东向战略”既是地缘上面向东方,更是政治上面向东方,即由立足西方,转为立足第三世界,独立自主判断和处理国际事务。有媒体称,土耳其

正从长达数世纪的睡梦中醒来,并开始重温“奥斯曼帝国旧梦”。^④

二、土耳其转向东方的深层原因

土耳其长期奉行亲西方战略,现在却掉头向东,在中东扩大影响力,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土国内政治气候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土推行“东向战略”提供了思想和政治动力。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世俗力量主政,军队更是坚定地为世俗化和西向政策保驾护航。然而,土耳其毕竟有 97% 的领土在亚洲, 93% 的人口是穆斯林。它可以在政治制度、外交上效仿和依附西方,甚至连文字、历法、服装都全盘西化,但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根脉和心理结构却无法随之刨除。土耳其始终无法绕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其一直强调自己的“土耳其属性”,而构成这一属性的东西,除了血缘和语言,很重要一点就是伊斯兰教。“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 2500 年历史的突厥传说和具有 1300 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⑤“土耳其与伊斯兰的联系是其集体身份中内在、本能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构成了土耳其确定其历史地位的基本力量。”^⑥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过去已经比任何其他伊斯兰人民更进一步使自己和伊斯兰等同了起来,从而使自己的原来面目被埋没于伊斯兰之中。”^⑦这使土耳其社会长期存在裂缝:精英阶层多认可西方化道路,而中下层民众则保留更多的伊斯兰和东方情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数以百万计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民从乡村涌向城市。到 80-90 年代,城市贫民阶层迅速扩大。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反映到政治斗争中,就是伊斯兰色彩政党的日趋壮大乃至

¹ David Bar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46

^④ John Feffer, “Turkey: Stealth superpower”, *Asia Times Online*, June 15, 2010.

^{⑤⑥} 哈全安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7 页。

^⑦ Kemal H. Karpat, “The Ottoman Rule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1994”, Edited by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 p. 38.

^⑧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21 页。

上台。上世纪 60 年代的民族秩序党, 1972 年成立的救国党 (1983 年更名为繁荣党), 都有浓重的伊斯兰色彩。1996 年, 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上台执政, 其首个出访国家就是伊朗, 并于 1996 年 8 月 12 日 (即美国政府签署制裁伊朗的《达马托法》出台一周后) 与伊朗签署购买 200 亿美元天然气的协定。此后, 埃尔多安将繁荣党改造成一个更加世俗化, 更具现代视野的新党——正义发展党 (AKP), 并在 2002 年上台执政, 2007 年再次当选。伊斯兰势力在土政坛上升, 使面向穆斯林世界的“东向”思想日趋上升为政府意志, 成为伊斯兰主义政府寻求精神家园历程的一部分。^①

其次, 土耳其综合国力不断增长, 刺激了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梦。土耳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在布热津斯基眼中, 土耳其既是“地缘战略棋手”, 也是“地缘支轴国家”。同时, 土耳其还是连通中东、中亚与欧洲能源通道的中枢地带。据报道, 土耳其境内已建成和将要建成的跨国油气管道线有多条。其中东西向干线有 5 条, 南北向干线有 3 条。目前, 俄罗斯能源出口的 60%, 伊朗能源出口的 30% 经过土耳其。过去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现在是“条条管道通土耳其”。土耳其自身能源资源并不富足, 但却凭借能源通道枢纽的位置, 极大提升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外, 土耳其经济实力也不可小觑。过去 10 年中, 土耳其经济总量增加了一倍, 其传统经济发展较快, 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表现不俗且在势头上几乎可以赶超印度。目前该国是“展望五国”和 G20 成员, 经济在世界排名第 17 位。据估计, 到 2050 年, 该国经济规模有望进入世界前 10 位。土耳其国力蒸蒸日上, 极大地激活了其地区大国梦。^② 2009 年 5 月始任外交部长的达伏托格鲁认为, 土耳其应该向地区超级大国方向发展, 恢复古代奥斯曼帝国历史雄风, 重建同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中亚人和高加索人的传统关系, 而伊斯兰正是土耳其与这些地区的共同精神纽带。^③ 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事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第三,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为土推行“东向战

略”提供了外部拓展空间。土耳其 (包括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 长期蛰伏于西方阵营, 直接原因就是苏联 (俄国) 威胁的担心。^④ 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俄国就将打通南下出海口视为世纪夙愿。^⑤ 土耳其因扼守黑海出海口, 而被俄视为掌握着“俄国房间的钥匙和大门”,^⑥ 并成为俄南下扩张的首要目标。据统计, 17 世纪后的 300 多年来, 俄与土共爆发 27 次战争, 土耳其人祖先在战争中每牺牲 3 个人, 就有 1 个是对俄作战而死。^⑦ 俄无疑成为土最大的威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 奥斯曼帝国采取了“以英制俄”的均势政策, 这差不多是土耳其现代西向战略的雏形。

然而, 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废墟中新生以及苏联推翻沙皇统治, 并未终结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噩梦。二战尚未结束, 苏联便开始觊觎土耳其。据战后缴获的纳粹文件证实, 斯大林 1940 年 11 月就曾要求希特勒同意俄国在军事上有效地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 以此作为苏联与纳粹德国进一步合作的酬劳。1944 年 10 月 11 日, 斯大林与丘吉尔谈判时, 仍提出涉及土耳其和黑海海峡的政策问题, 并提出重新修改蒙特勒公约 (管理海峡) 等要求。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 “英国感兴趣的是地中海, 而俄国感兴趣的是黑海。”^⑧ 为此, 斯大林支持卡斯和阿达汉地区回归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⑨ 1945 年 3 月, 苏联宣布废除《苏土互不侵犯条约》, 要求苏土

^① Reza Akhlaghi, “Turkey bakes on shaky ground”,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 2009.

^② John Feffer, “Turkey: Stealth superpower”, *Asia Times Online*, June 15, 2010.

^③ 伊光编译: “土耳其对穆斯林世界新战略”, <http://www.islanhk.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4364> (上网时间: 2010 年 9 月 12 日).

^④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pp. 66, 14.

^⑤ 彼得一世在其政治遗嘱中明确称, “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 谁统治那里, 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参见张建华著: 《红色风暴的起源: 彼得大帝和他的帝国》,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 第 400 页。

^⑥ Alan Bodger, “Russia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edited by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 UK, 1984, p. 77.

^⑦ 肖宪、伍庆玲、吴磊等: 《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06 年, 第 59 页。

^⑧ [俄] 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 王仲宣等译: 《斯大林与丘吉尔》(1941—1945), 东方出版社, 2006 年, 第 489 页。

^⑨ Bruce R. Kunihohn, “Turkey and the West Since World War I”, Edited by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 p. 44.

共管海峡,允许苏联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等。次年8月,苏联要求土耳其修改国际会议关于管理海峡条约,使海峡仅受黑海国家(实际是俄国及其卫星国)控制。所有这些,暴露了苏联对土耳其构成的潜在威胁。¹由此勾起了土耳其人对历史上俄国世纪性威胁的回忆,促使其再次倒向西方阵营。^④

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发生颠覆性变动,由此使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环境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此前,原苏联南高加索地区与土耳其直接接壤,而在此后,该地区出现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独立的小国家,将土耳其与体型依然庞大的俄罗斯在陆路完全隔开,由此极大缓解了困扰土耳其几个世纪的安全困境。而且,苏联解体留出巨大的地缘政治空白,为土耳其向东方扩展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此大背景下,土耳其不再满足于充当西方地缘棋盘上的棋子,而试图成为自主性更强的地缘棋手。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掉头向东,利用在语言和种族上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新独立国家的相似性,试图用泛突厥主义整合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但中亚国家对土心存戒备,俄罗斯对中亚影响犹在,加上土耳其国力有限等种种制约,土耳其此次“东向”因而虎头蛇尾。^⑤但是,土耳其外交上的选择空间增大,东向趋势增强,则是不争事实。

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缘环境再次出现有利于土耳其的变化。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更趋衰落:埃及日趋丧失阿拉伯领头羊的地位,伊拉克遭彻底削弱,沙特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综合实力。而在非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虽然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却始终被地区国家视为“异己”,不可能在地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伊朗势力日趋壮大,但多数阿拉伯国家对波斯/什叶派属性的伊朗高度提防,加上美国四面围堵,伊朗在地区内崛起阻力重重。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更愿意与土耳其一道反对波斯人。这为土耳其填补中东权力空白提供了绝好机会。土耳其曾在历史上长期统治中东,现在又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还是中东与欧洲能源的中枢和交汇点,“土耳其模式”在中东颇有影响

力。在中东扩大影响力,对土耳其也是难以摆脱的巨大诱惑。因此,土耳其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主客观条件。

最后,西向战略的“边际效益递减”,促使土耳其加快战略转型步伐。土耳其长期奉行的西向战略(既是指在制度乃至文化领域效仿西方,也是指在外交上倚重西方或亲西方),实际是一种追随和搭车的战略。同奥斯曼帝国时期相似,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土耳其的基本需求,如安全威胁得到缓解,获得西方一定援助和贸易机会,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发挥象征性作用等等。^{1/4}然而,这种追随战略是以投靠换取安全,而不是平等合作。因此,土耳其从一开始便面临被西方利用的可能。就实践而言,土耳其短期获益甚多,但长远得不偿失,尤其是导致其在国际上自我矮化,处于从属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边际效益递减”特征日趋明显。

以安全问题为例。二战刚结束,英美就先后承担起援助土耳其的任务,并在1953年将土耳其拉入北约。冷战时期,土耳其一直处在西方抵御苏联扩张的前线位置。如果东西方爆发战争,土耳其将成为西方阵营直插苏联心脏——高加索地区的一把尖刀。土耳其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有价值的战略盟友。^{1/2}为抵御苏联南下,西方亟需将土耳其建成坚固的反苏堡垒。所以,西方重视土耳其,不过是将其当作遏制苏联扩张的马前卒。北约将伊斯肯德伦、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萨姆松等地作为重要海军基地,还在土境内部署先进的“朱庇特”导弹。这看似使土耳其更加安全,实则将其推至随时可能牺牲掉的挡箭牌位置,而真正受到保护的是欧美国家的安全。正如一些军事专家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前哨基地永远是一个暴露的地点。在原子弹与火箭炮的时代,处于挡箭牌的地位是死路一条”。^{3/4}而

¹ [美]戴维森著,张增健、刘同舜译:《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69-170页。

④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p. 12

⑤ Ziya Onis “Turkey and Post-Soviet States: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No. 2, Summer 2001, pp. 66-74

^{1/4} David Ba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p. 45.

^{1/2} David Ba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p. 1.

^{3/4} 帕姆·杜德著,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287页。

20世纪 60年代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是美苏交易的结果,其决策过程仍未认真考虑过土耳其的安全感受。冷战刚结束,西方有人认为是土耳其没用了,对它的责难接踵而至;而到海湾战争时期,土耳其又变得有用了,西方大国又急忙用一批淘汰下来的旧武器鼓励它卖命;海湾战争打完后,土耳其再次“贬值”,于是又有人要追查那批旧武器是否用于镇压库尔德人。¹ 西方对土耳其反复无常,实则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对土耳其来说,通过追随西方来谋求安全稳定,基本上是靠不住的。

在入盟问题上,土耳其更是“一把辛酸泪”。土早在 1963年就在创建欧盟协议上签字,并确定为潜在成员国,但直到 1999年才获入盟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但一直进展缓慢,35个“谈判章节”中只开启了 13个。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仅主张接受土耳其为二等“享有特权的伙伴国”。由此使土耳其入盟之路更加遥遥无期。土耳其人对此怨愤日增。他们认为,土耳其对北约所做贡献有目共睹,但西方在回报土耳其时却极其小气和势利。经济欠发达显然是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④ 土耳其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 2%,人均 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 28.5%。如果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意味着其他欧盟国家将背负沉重的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即使土耳其 2025年入盟,欧盟也将为之花费 170亿 - 280亿欧元。此外,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远低于欧盟不到 5%的水平。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欧盟要为土提供高达 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资金。^⑤ 由于土与欧盟经济发展上存在巨大差距,加上土耳其的“穆斯林国家”身份,欧盟始终不愿接纳土耳其。

土耳其之所以在西方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状态,恰恰与其同西方靠得太紧直接相关。土耳其工业落后,理应高树关税壁垒,悉心保护民族工业。事实上,凯末尔在 1927年曾颁布《奖励工业》法,保护民族工业,禁止利润汇往国外。但上世纪 5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汹涌而来,并要求土政府

降低关税,放宽输入限制,允许将企业所获利润汇往国外。土政府接受了西方资本的种种要求,使土耳其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⑥ 20世纪 80年代,土推行自由化政策后,屡被西方经济危机殃及。1994年,土耳其爆发第一次金融危机, GDP下降 6%。2000年初,为使土经济达到欧洲标准,土耳其埃杰维特领导的联合政府按照 MF的教条进行经济改革。结果,土年底就爆发金融危机,经济损失巨大,直至 2002年底才稍有缓和。某种程度上,土正是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牺牲品。^⑦ 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使土始终在产业链中下游徘徊,无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出现一个悖论:欧盟以土耳其经济不够发达为借口拒绝其入盟,而土的不发达正是由于土按照西方标准行事、与西方靠得太紧。这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循环,使土入盟面临难以突破的“玻璃屋顶”,而且“土耳其越是想融入西方社会,这种政治紧张就越明显”。^⑧

西向战略屡屡受挫,使土耳其人日渐明白一个道理:西方不过是将土耳其当作廉价工具使用,与西方“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内公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从 2002年的 70%降至现在的 50%。^⑨ 2010年 3月民调显示,65%的土耳其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能最终加入欧盟,另有近半数受访者感觉土并不真正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近年欧洲经济危机频现,也使部分亲欧人士失去了对欧洲的敬畏。^⑩ 土耳其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冷淡,近 80%的土耳其人认为美国是个麻烦,甚至有人认为美是土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¹ 杨曼苏:“土耳其向何处去”,《西亚非洲》,1997年,第 2期,第 29页。

^④ Translated from the Turkish by Dexter H. Mursabgh,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18.

^⑤ 王伟:“从土美交恶谈地缘政治中的土耳其”,《舰载武器》2007年,第 12期,第 16页。

^⑥ 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 120页。

^⑦ [美]亨利·刘著,颜剑英、刘卿摘译:“土耳其金融危机的教训”,《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 4期。

^⑧ David Barhaad, *Turkey and the West*, p. 3.

^⑨ John Feffer, “Turkey: Stealth superpower”, *Asia Times Online*, June 15, 2010.

^⑩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Ambitions and Constraints”, *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 203*, 7 April 2010.

显然,无论就政治还是经济而言,土耳其在欧洲注定只能是个小角色。土如果矢志追随西方,只能继续充当西方的跟班和仆从。土在动荡、破碎的中东则是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土转向东方,不仅可能争取更高国际声望,也可在欧洲经济萎缩之时在中东拓展商机。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得不改弦易辙,从东方寻求自我救赎之路。

三、“新东方政策”路途坎坷

从理论上说,东向战略使土耳其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进道路,土在东向道路上应该可以走得更远。但是,土耳其的东向战略注定阻力重重,路途坎坷,其原因是它受到种种因素制约。

首先,“西向战略”的影响根深蒂固。经过多年西向战略的实施,西方现代主义和进步观念已成为土耳其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①土耳其各方面仍更多借重西方,对欧盟出口占土出口总量的一半(又说70%),而对中东的出口只占1/4,这意味着土耳其国家根基仍扎在西方一边。土耳其“东向”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向”受挫所致,今后一旦入盟顺利,东向势头必将减弱。一位土耳其评论家认为,土耳其不会抛弃西方,也不想抛弃西方,西方仍是土耳其的优先考虑。^②而欧盟随着一体化进程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亟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土耳其地缘战略重要性重新凸显,因此欧盟也不允许土耳其脱离欧洲的序列。2010年7月12日,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在媒体刊文指出,土耳其处在一个世界政治关键地区的绝佳地域政策位置上,对欧洲安全而言尤其如此。没有土耳其的支持,西方在那里将没有作为或者是难以有大的作为。所以西方(尤其是欧洲)必须最终将土耳其真正视作伙伴,而不再是西方的委托国。^③7月27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土耳其,并承诺将“铺平安卡拉和布鲁塞尔之间的道路”。^④显然,欧洲不会放弃土耳其。事实上,土欧之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真正分开。

其次,中东局势本身的复杂性。自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便沦为地缘破碎地带,再无兼具足够软实力和硬实力、足以维持地区稳定的核心国家,由此

使中东国家既无法有效排解内部矛盾,也无力阻挡外部大国强行介入,甚至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力量解决内部冲突(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海湾国家邀请美国帮助),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折冲樽俎提供了契机。因此,任何有一定雄心和实力的国家,都有机会介入中东。然而,中东地区国家林立、矛盾复杂,中东事务看似准入门槛低,实则机会成本非常高。土耳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它高调介入中东,在博得阵阵喝彩的同时,也引发几乎同等的质疑和抵触:加强与哈马斯关系,会惹恼埃及和以色列;支持伊朗则得罪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走近,潜在地损害与格鲁吉亚关系;与亚美尼亚走近,可能惹恼阿塞拜疆。例如,针对土耳其在加沙救援船事件中的表现,阿拉伯媒体看法就截然不同。强硬派对土耳其大加赞扬,称埃尔多安总理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真主党支持者在加沙、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高举土耳其国旗和埃尔多安画像,并称其为“阿拉伯世界之王”;还有媒体认为,本次事件促成了土耳其-阿盟甚至土耳其-阿拉伯-伊朗的联盟。温和势力则质疑土耳其的动机。如埃及媒体认为,土耳其是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沙特专栏作家奥塔泰比称,埃尔多安是企图再次控制阿拉伯国家的“新时期奥斯曼”;科威特报刊专栏作家认为,土耳其此举意在加沙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⑤一位埃及官员指出:“土耳其人是笨拙的玩家。在很长时期内,他们不会精通中东问题。他们只是被公众舆论推着向前走,土耳其政府很可能是想证明给西方看,他们是个有影响力的玩家。但我很怀疑他

^① Kemal H. Karpat “The Ottoman Rule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1994”, Edited by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 p. 3.

^② Reza Akhlaghi “Turkey balances on shaky ground”,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 2009.

^③ [德]约施卡·菲舍尔:“人们如何驱赶一个伙伴”,《南德意志报》2010年7月12日。

^④ “英国首相卡梅伦:将力促土耳其加入欧盟”, <http://www.cnstock.com/index/gdlibb/201007/711713.htm>。(上网时间:2010年9月12日)

^⑤ R. Green “Arab Positions on Turkey in Wake of Flotilla Clash Support vs Fears of Its Growing Regional Influence”, <http://www.menr.org/report/en/0/0/0/0/0/4383.htm>。(上网时间:2010年9月12日)

们有什么具体影响,用‘庸人自扰’来形容土耳其再合适不过。”¹ 土耳其能否承受这种几乎正负相抵的政策效果,令人怀疑。

另外,土耳其与中东国家间的相互猜忌根深蒂固,这也妨碍土耳其在中东扩展影响。伊朗作为与土耳其幅员和雄心相当的地区大国,始终将土耳其视为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潜在竞争者。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曾遭受土耳其统治,因此,土耳其在中东扩大影响的做法很容易激起阿拉伯人的痛苦记忆和疑惧心理。阿拉伯人还将土耳其视为高度西方化和亲美国国家,对其隔阂甚深。^④ 而对土耳其人来说,由于阿拉伯人曾当过 400 年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土耳其人在内心深处不怎么瞧得起阿拉伯人,^(四) 很多人对 1916 年“阿拉伯大起义”耿耿于怀,认为阿拉伯人是在土耳其背后“捅了一刀”,至今觉得阿拉伯人不可信。^¼

第三,土耳其以中东为经营重点的战略转向直接触动美国逆鳞,由此引发美国的遏阻。中东地缘位置和能源地位极其重要,美国一直将该地区视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冷战后,美国共发动 4 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其中 3 场在大中东地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目的就是试图按自己意志重塑中东政治。而土耳其将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并更多与中东反美激进力量站在一起(如替伊朗出头、交好叙利亚、结交哈马斯、敌视以色列等),表明土耳其已不满足于简单地充当地区热点调停者,而是试图重塑中东秩序,因此极大威胁到美国的战略部署。这样,土耳其无形中从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成了美国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举个例子。2010 年 5 月 17 日,土耳其与巴西携手,与伊朗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此举无疑有助缓解伊核局势,也提升了土耳其的外交影响力。但美国对此置若罔闻,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决议,这不啻扇了土耳其一记耳光。这从侧面表明,没有美国的默许,土耳其在中东重大问题上很难发挥重要作用。

结语

从地缘政治看,实现崛起的国家一般都位于边缘地带,在其发展壮大后再向中心区域突破。这种

地缘位置使其崛起阻力最小,类似围棋中的“金角银边草肚皮”。但土耳其情况恰好相反,它地跨欧亚两大洲,土耳其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是“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½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奥斯曼帝国就实力而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弱小,但却距离欧洲列强太近、处在其殖民扩张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先后遭遇英、法、奥匈帝国、俄等列强的蚕食,以致日益削弱直至最终解体。现代土耳其劫后重生,但依然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在这种枢纽地带,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允许土耳其脱离西方轨道,完全自行其是。但是,土耳其与邻国相比并不算弱小,因此始终不甘于扮演大国的跟班和棋子,只要有合适机会,总试图充当独立的地缘政治棋手;只是因为不够强大,它在遭遇更大的地缘政治玩家时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成为别人棋盘上的棋子。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悲哀就在于:在它力量相对强大时(奥斯曼帝国时期),却是强敌环视,鲜有地区扩展的机会;而当地缘环境根本改善(苏联解体,中东乱局)、提供了大显身手之机时,却变成幅员和实力有限的“中等国家”。这类国家承受损失的能力有限,更适合奉行多边主义、承担冲突管理,以及发挥道义力量。^¾ 就此而言,土耳其最适合充当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和掎客。土目前所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很可能像上世纪 90 年代初“泛突厥主义”一样,高开低走,有始无终。○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Ambitions and Constraints”, *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 203*, 7 April 2010

^④ David Barakat, *Turkey and the West*, p. 47.

^(四) [美]戴维森著,张增健、刘同舜译:《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第 173 页。

^¼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pp. 11, 19

^½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46 页。

^¾ Adam Chapnick, “The Middle Power”,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 7, No. 2, Winter 1999, pp. 73—82.